

情系舞台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小记戏剧史家陈多先生

谢柏梁

《中国戏剧》1998 年第 9 期

—

谢柏梁



陈多先生

一、家世渊源

陈多先生祖籍福建，1928年降生在东北的洮南。两岁时随母亲到北京，一住就是12年。他先后曾在北师大附中、苏州江苏省立一中、徐州铜山中学、福州三民中学读书，在南北东西的辗转求学过程中接纳了江山的灵慧之气。

家世的渊源，生活的环境，都是陈多先生与戏剧结缘的种种契机。

陈多先生的曾祖母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她曾于民国初年在长沙开办过女子师范学堂，这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堪称是一段佳话。曾祖母还酷爱戏剧，为此特意开了一家戏园子，曾从上海请欧阳予倩、陈大悲等艺术家来长沙演过戏。

祖父陈天听烈士的生命却十分悲壮。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到日本留学，毕业时乘海船回国。在船上适逢一日本狂人，陈天听愤然曰：“吾中国受尔压力久矣，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边说边把日本人往船头拖。胆小的日本人弃衣而逃，陈天听遍寻不着，忧时忧国，一气之下，蹈海身亡，以宁折不弯的人格精神壮烈殉国，年仅35岁。阿英所编《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钞》便收有陈天听的遗诗。陈天听以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一出捍卫国格的悲剧。

父亲陈国翰，先曾在长沙女子师范教过书，并在此与学生张璧辉恋爱结婚。之后，成了一位能言善辩、不苟言笑的大法官。母亲张璧辉，喜尚艺术，水墨丹青，吹箫唱曲，都有一定造诣。

作为诗书礼仪世家，陈家对后代教育煞费苦心。在陈多之上，尚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母亲除了让三儿一女接受正规的学堂教育外，另外还延聘了一位家庭女塾师教导儿女们。这位女塾师是旗人，早年曾在皇宫中陪公主读书，不仅淹通经书，而且精于英文和数学等新学。在她的严格教诲下，陈多从小就能背诵《四书》，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底子。

如此家世与环境，出革命家也好，出哲学家也好，出戏剧家也罢，全都理所应当。陈家四兄妹，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有体面的职业。

从旧家长的眼光来看，最为离经叛道的孩子，还是生性活泼、钟情戏剧的陈多。

二、追求戏剧

陈多先生自小就与戏剧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除了苦读经书、出入学堂之外，小陈多还不失时机地跑戏院、赶堂会，不知看过了多少出京戏。“四大名旦”中除梅兰芳没看过之外，其他名旦都耳熟能详。高庆奎、谭富英、马连良等名角的戏，都可以背出来了。

哪一天能有小陈多登台表演的机会呢？

机会来到了眼面前。新式小学毕业时，必须要有一个颇为热闹的联欢晚会。小陈多抓住时机，自编自演了一出算命先生在人前算天算地、算鬼算神，但却算不出自家失火，闻讯后仓惶逃窜的喜剧。这出喜剧无疑是晚会上最为风光的一档节目，同时也拉开了陈多先生戏剧人生的第一道序幕。

一发而不可收拾。陈多在初中时代便正式参加了学校剧团。初中毕业后，陈多摇身一变，加入了苏州中艺剧团的《浮生六记》剧组。当时的大牌明星郑重演父亲沈三白，国立剧专第一期毕业的丁芝演母亲云娘，小陈多则扮演他们的儿子。这是陈多先生所参与的第一次专业演剧活动。在徐州求学期间，陈多亦积极参加戏剧活动。他曾与一二同学相约：十年后台上见！

为了这一份约定，为了自小的爱好，为了对艺术的追求，为了发扬光大当年曾祖母在家族后代中撒播下的戏剧种子，在 1947 年报考大学时，陈多终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戏剧院校。

在当时的社会中，作为名门望族之后，身为法官的公子，陈多居然要“宦门子弟错立身”，这当然是陈家所不能通融的原则问题。为了不使大人们察觉，陈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假借到上海攻读法学院为名，实则当时的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读书，从而把自己的终生交付给了戏剧事业。

当然，西洋镜总有被戳穿的时候。当大学生陈多返回台湾的新家度假时，家人发现其所携带的图书，尽是《演员自我修养》之类的艺术书。至于法律书籍呢，却是连半本也没有。于是陈多之本心，家人尽知。但是木已成舟，只是徒叹奈何。父亲得知此事，即刻写了一封家书给陈多，斥责说：

——不肖子弟，粉墨登场，有辱家门！

然而陈多追求戏剧、投身艺术的决心，虽九死而不悔。从此，中国少了一位法官，多了一位戏剧家。

三、票友与专家

尽管陈多先生在戏剧专门学校读了三年表演系，尽管他是历经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三朝元老，然而对戏剧专业而言，陈多先生总是有难于全力事之的“票友”感觉。

读书时，陈多既学表演，又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当时是艺术、革命两不误。毕业后先当表演课助教，倒也与专业一致。但是不久后他奉命离开了心爱的表演专业，脱产担任校长秘书和中共上戏党支部书记，行政工作倒变成了他的主业。从此之后直到老年，陈多先生也饰演过一些戏剧、影视的角色，但也只能是属于“票友”性质而已。

专事行政工作后，在专业上不甘寂寞的陈多先生颇感遗憾。如何建树一桩既与工作不矛盾、又与戏剧有关系的事业呢？

再三参定之后，陈多选择了中国戏剧史研究的课题，把业余时间交付了学术研究。好在他会表演、懂戏剧，小时候又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基础，更兼他有着独立思考、善于思辨、勇于推翻成说做反面文章的理论品格，所以最终成就为一位独树一帜的戏剧史专家。

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将陈多引入门庭的导师首推赵景深先生。是他介绍陈多购买《元曲选》、《曲苑》丛书等必备著作。另一位导师是董每戡先生，他也在上戏执教过。相比较之下，陈多更为欣赏董先生。他认为赵先生是传统的治曲方法，太局宥于材料；而董先生长于思辨，认为成说未必可信，喜欢做反面文章，这更符合自己的性格。而且董先生贯通古今中外，关于中外戏剧的几本简史也写得引人入胜，这都更合自己的胃口，所以陈多一直以董门弟子自居。

陈多的第一篇上万字的学术论文，就是以做反面文章的面貌出现的。1954年，陈多在《戏剧报》上发表文章，对戏剧史研究权威周贻白先生的某些学术观念提出异议。周先生认为宫廷演剧值得重视，岳飞、秦桧皆有可褒贬处，陈多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并认为繁琐考证亦不可取。受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文章上纲上线的调子也不低。陈文一出，周贻白先生的两大弟子傅晓航、祝肇年也起来响应，但文章的调子要低得多，相对而言较为实事求是。

1955年，陈多又发表了《试谈高则诚〈琵琶行〉》一文。次年，二十多岁的初生牛犊陈多参加全国性的《琵琶记》研讨会，在众多学术权威面前，对该剧予以整体否定。从此，陈多声名鹊起，为天下学人所关注。

大起必有大落。踌躇满志的陈多继续努力。新作《试谈李笠翁的写剧理论》尚未连载完，上海戏剧学院反右办公室陈多主任却因同情右派，自己也被划入了右派行列。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2年，直到1979年才摘下。然而政治上的不幸却是学问上的大幸，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陈多坚持读了不少书，做了大量笔记。

新时期以来，陈多先生厚积薄发，先后出版了《李笠翁曲话》、《王骥德曲律》、《中国历代剧论选》（以上两部系与其高足叶长海合著）和《剧史新编》4部专著，在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里，建立起自己的堂庑。

四、学术品格

如何看待陈多先生在其戏曲史研究堂庑中所呈现出的学术风貌与品格呢？

以能否登场演出、是否符合舞台艺术的规定情境和特殊规律，作为研究戏曲史的根本原则和衡量戏曲文学高下的基本标准，这是陈先生治曲的总的出发点。

由此出发，陈先生以舞台之全境来端详案头之曲文，所以他对精于场上、讲究戏情的李渔特别偏爱。他在对李渔作品及其理论的评析过程中头头是道、语语知心，认为李渔剧论全面涉及到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剧目选择、演员训练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民族戏曲艺术作出了较为全面、周到甚至是体系化的总结。陈先生还认为李渔的人品非常高尚，属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领导潮流的人物；李渔以实践者和倡导者的姿态出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启蒙思想家李贽还要走得更远。对李渔做出较高同时也符合实际的评价，对李渔剧论做出具体、深刻而全面的阐发，陈多先生是20世纪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人。

由此出发，陈先生对《桃花扇》这样史有定评的名剧提出了迥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此剧至多是非舞台化的文人案头之作，许多地方不仅不合戏理，而且有悖于常理。诸如香君上场时听到“梳拢”大事后的无动于衷，以及她一以贯之的少年老成、理胜于情，都使得此女可敬而不可爱、不可信。《桃花扇》在诸多方面都有违戏曲脚本规律，不适合舞台扮演要求，不适应剧场观众审美需要，全剧甚至没有真正的贯串线……从此意义上言，陈先生甚至认为孔尚任把好好一个传奇题材给糟蹋了。

这就显示出陈多先生独立思考、不拘成说、融铸新论、成一家言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并不局限于对一些枝节问题的小修小补、小打小闹，而是对近现代戏曲史研究的总体不满。他坚持认为：尽管 20 世纪的戏曲学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但真正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戏剧史发展轮廓仍然相当模糊，尤其在基本的研究观念与方法上存在着若干问题。因此中国戏剧史应当重写。从具体文风上看，陈多先生认为如果一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不能引起不同意见，那么肯定是一篇没有价值的文章。在《剧史新说》序言中，陈多先生再三提及，书中许多论点时常引起若干学者专家的“不敢苟同之见”，陈先生对他们的高见也同样“不敢苟同”。没有独立思考、标新立异的学术品格和理论胆识，没有扎实的治学功底和充分的材料占有，也就很难推动学术事业的持续发展。

关于戏曲的形成，以王国维为首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在宋元时期。陈先生则以精心的梳理、缜密的考证，认为中国戏剧早于史前宗教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萌生。傩与俳优戏即是建立在生活原型基础之上的具有戏剧成分的表演。陈先生还与谢明先生一道，将一些《诗经》名篇改成了歌舞剧台本，认为春秋时期确已产生了古歌舞剧。通过一系列考证文章，陈先生的“远古戏剧说”、“先秦古剧说”业已深入人心，极大地引发了戏剧学者们的思考。

此外，关于宋代并无南戏称名的发微，陈多先生提出周密的《齐东野语》有“官本杂剧段数”一节，其中就包括了南戏的内容。陶宗仪《辍耕录》中所提到的院本目录，其中就包括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杂剧。所以名称与实体，必须具体而言，不能无所顾忌地大而言之。

关于《琵琶记》、《娇红记》、《桃花扇》等著名悲剧，陈先生都先后提出了一些大异于时尚的诘难，而且都能言之成理、自成一说。至于陈先生对《牡丹亭》曲意的深刻品评、对臧懋循、孟称舜和李渔的高度评价，都使得学术界耳目一新。

作为一位承上启下的戏剧学者，由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到上海戏剧学院，陈多先生已先后在此学习、工作、执教 50 余年。半个世纪以来，陈多先生

不仅在学术堂庑的建树上独具品格，而且在学术梯队的交接上做得非常出色。上承董每戡、赵景深先生，团结陈古虞、陈汝衡先生，直接培养第三代叶长海教授，悉心指导第四代谢柏梁教授，这使得上海戏剧学院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梯队结构合理、源远流长。

年逾古稀的陈多先生，至今还在给本科生上课，还在勤勉治学。他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戏剧事业。

《中国戏剧》1998年第9期

厦门大学图书馆